

# “小市农”的城市记忆与体化实践

## ——对重庆市 Z 空间“城中地”中的种菜生活考察

张伊铭

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重庆市 Z 空间“小市农”在“城中地”上的体化实践, 结合“记忆的微光”这一概念展开经验研究, 探索超越“记忆之场”的城市记忆可能性。本文认为, 尽管 Z 空间中活跃着身份多重的居民, 但“记忆的微光”只存在于其间的 J 厂退休工人之中, 即后文所述的“小市农”。一方面, 历史上的“鞍钢宪法”鼓励工人为工厂奋斗终身, 这与工人需要照顾家庭的现实状况形成矛盾, 造成了工业生产与生活的剥离, 促使他们以种菜生活来补充“苦战”式生产, 忽隐忽现的个体微光也逐渐在“小市农”的体化实践中形成具像。另一方面, 在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下, “小市农”在与流动农民在同一“城中地”的实践碰撞和国家宏观叙事的压迫下, 仍保留着“城中地”的样态与种菜的习惯, 为“记忆的微光”营造了实践可能与生存空间。

关键词: “记忆的微光” 体化实践 城市记忆 “小市农”

中国在快速城市化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城市记忆的消失便是其中一点。为此,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要求保护老建筑、老工厂、老社区等, 以保存自己对城市的记忆与情感, 防止城市失去其精神与文化(梁立娜, 2015; 刘向南, 2017)。但城市建设并不会顾念个体记忆, 相反, 随着城市化对政治权力与经济促进, 就连文化本身也成为政治性与经济性的结合(佐金, 2006)。因而, 为使城市回归于人, 发掘与理解普通人的记忆在城市中的意义, 则变得更加紧要与迫切。

目前中国的记忆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权力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对个体记忆与情感的再造等问题(郭于华、孙立平, 2002; 郭于华, 2003, 2008; 王汉生、刘亚秋, 2006; 李里峰, 2007; 李放春, 2010), 对于底层记忆的关注则往往陷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框架之中, 因而关于普通人记忆的研究相对匮乏。刘亚秋(2010)将普通人的记忆定义为“记忆的微光”, 并认为它是属于个体的、难以诉说的部分, 因此需

要从康纳德所谈及的身体记忆（体化实践）与个体记忆的视角切入，进行深入讨论。目前学界对于“记忆的微光”的研究仍然有限，主要集中在学理的讨论与概念的明晰上（刘亚秋，2017）。<sup>①</sup> 本文则通过观察重庆市Z空间的“小市农”在“城中地”上的体化实践过程，讨论在城市化大背景以及权力缺位和社会变迁的环境下，Z空间“小市农”“记忆的微光”形成与保存的可能，并借此尝试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丰富此概念的内涵。

## 一、“小市农”与城市记忆

城市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类型，往往表现为城市空间中的历史文化象征（周玮、朱云峰，2015；Crinson，2005；孙江，2004；陈蕴茜，2007；李娜，2016；Boyer，1994；Hayden，1995；纳日碧力戈，2003）。博物馆、档案馆、墓地和收藏品、节日、周年纪念、契约、会议记录、古迹、庙宇、联想等，这些都是“记忆之场”（诺拉，2015）。实际上正是因为城市记忆遭到严重威胁，“记忆之场”的功能才会如此凸显，因此普通人在无意识中保留下的“记忆的微光”，将会成为超越“记忆之场”、把握城市记忆内涵的重要路径。刘亚秋（2010）认为“记忆的微光”可能非常细小，权力允许它若隐若现，甚至它游离在权力之外。她进一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对“记忆的微光”进行理论探究，认为它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记忆或创伤，并从人性、人的境况以及人之存在条件对记忆进行深入思考（刘亚秋，2017）。笔者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与对城市变化的观察，察觉到在数十年的城市变迁中，虽然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隐藏在重庆市主城区各个角落中的菜地却都保持旧貌。这一与主流城市风貌相悖的空间形态何以持存至今？或许这正是“记忆的微光”之隐秘表现。

笔者将这些在城市中心区分布的大小各异、品类不一的城市菜地，称作“城中地”，它们的前身多为城市核心区域中的闲置地。彭和强等人（2011）在对重庆市北碚区闲置地现状的分析中，将耕种闲置地分为四类。其中第Ⅱ类与第Ⅲ类为

---

<sup>①</sup> 刘亚秋主要是基于纯文本分析，而笔者则是基于质性材料进行的经验性分析，两者的研究路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研究意义却是相互补充与说明的。

本文所定义的“城中地”类型，即“坡度大的耕种闲置地——主要分布于江河沿线、城区内地势起伏较大的地方”，与“杂乱的耕种闲置地——零星分布于建成区内，尤其是建筑密度相对较小的地方”。不同区域的“城中地”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这与该区域各类型“小市农”的城市记忆相关。而“小市农”则主要指称那些自发在“城中地”上种菜的拥有记忆微光的城市居民，且这些居民大多为中老年人（钟穗慧，2016；周勉等，2016；汪志，2017）。什么样的“耕种者”拥有“记忆的微光”？“小市农”的记忆微光怎样产生又如何保存？它们如何在“城中地”中得以显现？本文将主要从这些问题入手，来把握“小市农”“记忆的微光”。

### （一）“小市农”的记忆

“小市农”大多是退休或无业的中老年人，他们并不全是人们想象中的进城农民，而是由退休工人与进城农民共同组成。哈布瓦赫（2002）曾认为老年人更加热切地关注过去，因为“这是社会赋予老人的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它鼓励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仍拥有的精神能量都贡献出来，用以进行回忆”。在柏格森（Bergson，1990）对记忆的分类中，一种记忆是将过去的经验与智识用于现在的实践中；另一种则是对过去的静态重复，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冷漠。前者为纯粹记忆，是生命在历史发展中的自发行动，而后者是机械记忆，与历史相断隔。柏格森强调个体记忆的重要性，并认为纯粹记忆才是真正的记忆。哈布瓦赫（2002）虽然认为老年人的记忆更偏向于纯粹记忆，但这种记忆的行动却来自社会结构的压力，而非老年人自身。

而“小市农”的城市记忆并非社会与个体的断裂，相反，它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延续，受制于社会结构，又体现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刘亚秋，2010）。“小市农”在年轻时基本都有务农经历，大多数人曾是农民。他们一方面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而进入城市（孟德拉斯，2005）。因此在进入城市后，面对突变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开始模糊：他们既不同于传统农民，又有别于现代的市民（张海波、童星，2006）。这种不安随着在城市中定居、适应与完全同化这三个阶段的推进而逐渐减弱（Sauvy，1969），他们逐渐找到了对自身记忆和身份的认同，最终以其所适应的生活状态安顿下来。

## （二）“小市农”的体化实践

“小市农”通过在“城中地”上的体化实践，完成其记忆的延续与传播。康纳顿（2000）认为“在纪念仪式中，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继续表演某些记忆动作的能力，完全有效地保存过去。”虽然这样的记忆传播形式依旧表现着权力制度的逻辑，但这样的体化实践过程却着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虽然不留痕迹，但却避免了在所有话语实践中可能遭受到的侵扰与冲击（高萍，2011）。之所以说是不留痕迹的，是因为记忆的体化实践往往表现为一个短暂的传达信息的动作，例如微笑、握手、餐桌礼仪等对文化特有姿势的记忆（康纳顿，2000）。

而“小市农”对周边闲置地年复一年的开垦和耕种，这样持续的体化实践是以种菜的一系列记忆动作为核心，在长时间跨度下保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生活状态的可感知的记忆形式。这与李娜（2017）总结的肯辛顿街区居民的“历史感知”与“文化敏感性”相似，都是居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讲述与感知。只是肯辛顿街区居民的记忆与地域相互交织，其社区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主要通过城市建筑与景观获得空间表述。<sup>①</sup>而“城中地”空间却是由种菜这种长时间的实践所生产的。城市空间成为集体记忆的记忆场所，对人们的记忆产生暗示的功用（李娜，2016）。随着保存在身体中的记忆具像化，种菜的一系列体化实践逐渐将“小市农”的情感与记忆在城市空间中还原，可观可感的空间形态又作用于耕种者与旁观者，使“小市农”的城市记忆获得进一步延续与传播的可能。

事实上，本文认为中国普通居民的体化实践，在空间维度上不仅表现为“城中地”，还表现为“城中村”。目前学界对于“城中村”的讨论相当深入具体，为思考“城中地”提供了有益借鉴。从记忆的角度来看，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介入，“城中村”与“城中地”逐渐成为一种反记忆的实践，并不断走向遗忘（Crimson，2005；王晓葵，2012）。之所以称它们为反记忆的实践，是因为这样的记忆不被官方所认可，而近乎成为挑战官方正规性与合法性的存在。政府借助政策设计与媒体宣传，

---

<sup>①</sup> 李娜（2017）将集体记忆的空间表述特点总结为“1. 根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焦虑和思索，具有现实性；2. 讲述共同的身份认同（a common identity），建构某种象征性的集体身份认同和归宿感；3. 由于影响或效果被激发，基于某种情感依赖而产生保护历史的愿望；4. 由于公众记忆发生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中，不同版本的历史解读在一定的空间中碰撞，因此带有片面性并充满争议；5. 依赖于实物或象征性的支持；6. 公众记忆需要实物性或象征性的表现方式；7. 本身拥有历史；8. 需要将公众记忆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文化实践随着时间和社会语境变迁而改变。”

将它们定位为“城市牛皮癣”“毒瘤”等，并通过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对其进行改造与重整，令其逐渐被城市居民排斥，进一步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蓝宇蕴，2001；许经勇，2013；赵铁琥，2015；梁东麒，2015；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1）。但无论是“城中村”还是“城中地”，其存在都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制度变迁历史紧密相关的，勾连着每个居民的生活记忆。李培林（2002）指出“城中村”的终结关涉到产权的重新界定与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等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同样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本来就拥有几千年的生态文明生产方式，人们维持了自己的传统农业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温铁军，2017）。因此，中国人对于农业种植的偏好与记忆持续地塑造着各个空间，改造“城中地”由此显得更为艰难，“城中地”也作为“小市农”寄托记忆与情感的场所，彰显着“小市农”生活的况味（黎云，2015；陆征，2017）。

正如“浙江村人”在项飏的研究中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与历史文化，保持着一种鲜活且不断生成的集体记忆（项飏，2000）；尽管城市闲置地上竖起了禁止种菜的警示牌，菜田却依旧不断增加，人来人往（钟穗慧，2016）。这些都更加提醒我们，“小市农”在“城中地”上的体化实践是讲述其“记忆的微光”的重要方式，是城市建设所忽略甚至敌对的另一种城市生活状态，更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在流动的时间中自发孕育出的文化与精神。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重庆市Z空间的“小市农”在“城中地”上的体化实践与日常生活方式，把握Z空间“小市农”的“记忆的微光”，为“记忆的微光”这一概念提供经验支持，也为城市建设提供超越“记忆之场”的可能性。

## 二、小生活与大生产：“里头”的“小市农”为何种菜

重庆呈现着中、低山和丘陵的地貌格局及“大城市、大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在人口和土地的利用结构上体现为以大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型直辖市”，其经济结构又折射出城镇经济的主导地位（肖轶等，2015）。这为“城中地”在重庆市中心区域<sup>①</sup>的出现提供了地理条件与心理支持。

<sup>①</sup> 重庆市主城区由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组成，其中渝中区为重庆老城区，是重庆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商贸流通中心。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与其毗邻，江北区、南岸区与其隔江相望。

本文的主要研究地是位于九龙坡区核心商圈附近、规模较大且交通便利的 Z 空间“城中地”，这里的土地归重庆市知名央企 J 厂所有。Z 空间的“城中地”是坡度大的耕种闲置地与杂乱的耕种闲置地的结合，且形态与规模令人瞩目：在一高达 30 层的商品房小区背后，红砖砌筑的围墙破开一条小径，沿着陡峭的小山包向上延伸。顺小径上行，能见到细碎的田土与野蛮的杂草共生，形态各异的肥料装具散发着腥臭，夏日蚊蝇在空气中聚成一团……普通居民们几乎很难走到菜地中间去，只能循着一条留给过路人的泥径继续前行。走到较为平缓的地界，左右又会出现菜地，它们依着单位住宅区，向着驾校练车场，一块挨着一块，绿油油的蔬菜似乎随手就可以被人摘了去。环顾四周，甚至还能看见掩藏在一排自搭棚屋背后的鸡鸭，在荒石上闲庭信步……俨然一幅乡村小景。

以驾校练车场为界，Z 空间菜地形成了高低位空间的分离，主要表现为位于低位的陡坡和位于高位的缓坡。在此耕种的人们也分为了在陡坡上耕种的流动农民<sup>①</sup>与在缓坡上耕种的退休工人。独自开辟出大半个陡坡进行耕种的 N 女士向笔者介绍道：

在这里种菜的勒些人我都认得到撒，都认得到，你想我种了好多年了嘛。你说刚刚你问的那个爷爷为撒子认不哪个到勒些人呀？因为他一般没在外头来，我们外头的，一般外头的、里头的都认得到，种菜的。（资料来源：N 女士访谈，20170412A）

N 女士依据菜地的位置对耕种者的身份进行了简单划分，“里头”的退休工人在缓坡上耕种，“外头”的流动农民在陡坡上耕种。从土地条件来看，缓坡比陡坡更适宜耕种，也更早地成为 Z 空间的“城中地”，而陡坡的大面积开荒则是在 2009 年 J 厂彻底搬离该区域之后。根据访谈，在“里头”耕种的主要是早期进入 J 厂做工的退休工人及其家属，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顺利考入 J 厂，成为单位制时期的工人，我们称之为“小市农”；在“外头”的则主要是近十余年（2000 年以后）进城打工的农民及其家属，他们依旧保持着农民身份，且在老家拥有农田，可称作“流动农民”（张海波、童星，2006）。N 女士对“里头”的“小市农”和

---

<sup>①</sup> 流动农民是往往结伴到同一所城市打工，“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他们还可以再回到农地（转引自张海波、童星，2006）。

“外头”的“流动农民”有着情感上的区分，“里头”的“小市农”不怎么向外走动，而“外头”的“流动农民”却有主动结交朋友的倾向。在“里头”耕种的退休工人与“外头”的“流动农民”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前者最早在Z空间种菜，他们从生产工作中争取时间，在住房周边Z空间的缓坡处开荒种地，并在制度变迁与体制转型中坚持下来，缔结了属于他们的记忆微光。

在那个时代，工厂的集体化生产是J厂工人生活的全部。1960年，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1977），将“鞍钢宪法”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的管理办法转发到全国各省市学习。报告中提道，“许多厂矿职工，为了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下火线”。这些J厂的工人也是如此。多名J厂退休工人在回忆工厂生产生活时都提到“苦战”，表示当年是“不管下好多任务好大任务，不睡觉！天天苦战，坚决完成”。<sup>①</sup>

尹老人自1952年进入J厂以来，从样板工人做起，到1994年以中干身份退休，工龄43年。在当工人期间，他天天苦战，完成任务；成为干部后，则要么到全国各地工厂参观学习，要么担心突发生产意外，日夜守在厂里，几乎完全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了。可见，在“鞍钢宪法”带来的全国性厂矿管理制度改革中，革命的动员扩大了生产政治的范围，工厂职工每天的生活就是加紧完成生产任务。虽然“鞍钢宪法”中也提及要“关心职工生活，安排好劳逸，使广大职工群众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促进生产不断跃进”，但在J厂的实际操作中，更多的却是每天生产结束后（17:00），组织职工们集体学习1小时，内容包括政治实事、产品质量、管理情况和工厂纪律等。<sup>②</sup>因此，职工们能够自由安排的时间极少，几乎都在工厂中度过。

随着工人们陆续组建家庭、生儿育女，“鞍钢宪法”集体动员的管理模式开始无法周全职工的家庭生活。“提职不提薪”的制度与困难时期的艰苦环境，使得大多数工人都遭遇生活困境。这表明，在“鞍钢宪法”强调的为工厂奋斗终身的意识形态背后，是工业生产与生活的剥离。因而尹老人的妻子廖老人在生育儿女后，便从任务量极大的“苦战”岗位转去了相对轻松的岗位，以便有更多时间经营家庭生

① 资料来源：尹老人访谈，20180720。

② 资料来源：尹老人及其妻子廖老人访谈，20180815。

活。而与廖老人相似的工人们，也开始纷纷找寻改善家庭生活的路径，自己开荒种菜便是其中之一。廖老人略微兴奋地回忆着当年种菜的场景：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种菜了哟，我们民主一村前面那里有一个草坝坝，男男女女都去抢地盘儿来种菜。我当时都抢到了一小块拿来种牛皮菜那些，我想迈，屋头已经有两个娃儿了，那阵经济又比较困难。我看勒些工人一个二个都在种，我也跟到起种点，不种白不种。我就每天下班来经忧（意为照顾）一哈勒些菜，星期天不上班就多点时间来弄。别个有些人得行（意为厉害）哟，弄了好多土来种，路边边卡卡角角（意为小角落）的都种起，做得还多好。（资料来源：廖老人访谈，20170308）

这种回忆起种菜时的兴奋劲儿是当下对困苦记忆的掩藏与回应。工人们最初种菜的动因，几乎都是为了缓解经济困难、政治动乱和粮食短缺等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生活负担，而这种负担是依靠工业生产无法解决的。他们要么离厂返乡种地，要么相继在住区附近开荒耕种，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但他们再次回忆起往昔的种菜岁月时，却抹去了伤痛与辛劳，将种菜视为自身能力与生活的一部分。M老人是廖老人的工友，他是出了名的“劳模”，已在Z空间持续耕种几十年。回忆起当年的艰苦岁月，他目光中仍闪烁着骄傲：

上班的时间我不去（种菜）撒，你去了违反劳动纪律的嘛，勒是国家规定的嘛。下班去撒，我两口饭就刨（意为快速吃），刨了就去了……只有61年、62年，那时候困难了，那不够吃，不够吃呀就不准做。那个时候我还是栽了50几块那个牛皮菜，就哪里有点土呀我就栽起，楞个的。我迈说回来说，没有，没有苦到……那阵我还是个老顽固哦。困难的时候哈，我们在十车间，我不在饭堂吃，我就个人（意为自己）拿个盅盅儿（意为饭盒），熬点稀饭，我吃了我又不挨别个的，别个也不挨我的，我们一年子，靠自己，不靠他人！就是楞个态度。（资料来源：M老人访谈，20170329A）

可见，M老人并不将下班种菜视作违纪行为，即便在明确禁止私自种菜的时期，他也将种菜视为个人态度的表达，是一种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形式。他早期

的耕种帮助一家七口度过了艰难岁月，这是他被需要的象征，也是他工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讲述中没有苦难，直到现在，他仍然感到种菜是令他高兴的事情，如果菜种不好，他就会感到烦恼。种菜变成了“里头”的“小市农”超越“记忆之场”的城市印记，也成为他们面对苦难的潜在表达。这作为他们小生活记忆对大生产记忆的补充与安慰，忽闪着个体记忆对宏观叙事若隐若现的微光。也正是如此，“小市农”的种菜实践开始发生，并重塑相关的城市空间，不断吸引同一境况的工人参与其中。

### 三、经营 Z 空间 “里头”的“小市农”如何种菜

Z 空间并非一早就作为“城中地”而存在，在 J 厂进驻九龙坡区之前，这一带仍是广袤的农村。虽然 1940 年的第三次城区扩建将九龙坡区纳入了城市范围（高群，1991），但据《重庆市九龙坡区志》记载，该区域仍旧以农田、田土、荒坡和棺山为主。由于周遭低平的农田较多，Z 空间的缓坡区域并未用于农业生产，而是以棺山的形式存在着，主要承担农村丧葬的功能。<sup>①</sup>

随着国民政府与工业企业的内迁，九龙坡区成为重庆市的核心工业区。<sup>②</sup> 1938 年 J 厂迁入杨家坪片区，令该街区由农业区逐渐向工业区转型（隗瀛涛，1991）。新中国成立后，为响应国家工业建设的号召，越来越多的工厂与单位陆续在杨家坪片区兴建起来<sup>③</sup>，工人数目也与日俱增。由于单位制的要求，各国营单位都需为其职工提供住房，于是整个杨家坪片区几乎成为以 J 厂为首的各单位的家属区。随着农

① 笔者在调研阶段也看到了位于 Z 空间的多处墓碑。

② 抗日战争前，区境内只有作坊等手工业。《重庆市九龙坡区志》记载，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汉阳恒顺机器厂（今重庆水轮机厂前身）、沙市沙厂（今重庆第六棉纺厂前身）、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西分厂（今重庆机床厂前身）、庆华颜料厂（今重庆染料厂前身）等相继迁入区境内李家沱、鹅公岩等地，开始形成以机械、纺织、化学、军品为主体的工业结构。虽然抗战结束后，区境内一些工厂毁于日军的轰炸、许多工厂随着国民政府的转移而纷纷外迁，但第 20 工厂（今长江厂）、第 21 工厂（今长安厂）、21 工厂第 1 分厂（国营汉阳兵工厂）、第 24 工厂（今特钢厂）、第 25 工厂（今嘉陵厂）、第 50 工厂（今望江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重庆钢铁厂）仍在重庆运作。

③ 据《重庆市九龙坡区志》第 432 页，同时在杨家坪相继新建国营空气压缩机厂（西南车辆厂）、重庆新华印刷厂、重庆动物园、重庆工业管理学院、重庆钢铁专科学校等单位。

田的消失与农民的迁出，Z空间也迅速被新建的J厂单位住房所包围<sup>①</sup>，陡坡区域开始成为J厂倾倒建筑垃圾与居民生活垃圾的“垃圾山”<sup>②</sup>。在职工们逐渐组建家庭后，正如前文所述，工厂制度改革与生产政治扩张开始剥离职工们的工业生产与生活。为维持生计，像Z空间缓坡区域这样离居住区不远的闲置土地，便成为一部分职工种菜的绝佳选择。

闲置地空间是体化实践具像化的重要条件，而种菜实践会如何影响此类空间的发展，则完全依靠“小市农”对土地的理解与作用。工人们耕种的菜地都不大，并且分散在缓坡的不同位置，其种菜方式也十分传统。他们通常不会在菜地中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而是收集人体排泄物与腐坏植物，通过搬运、窝肥、浇灌等步骤实现土地的灌溉与增肥。直到今日，在缓坡耕种的退休工人们依旧保持着这样的耕作习惯与土地面积，这是他们在长时间跨度下进行种菜的一系列记忆动作的表现。种菜的体化实践并未像话语实践一样随着时间而模糊，相反，却更加与记忆者的生活融为一体。

Y老人从还未退休时就在缓坡区域耕种，共拥有3块“巴掌地”（形容面积较小的土地），他说：

我一般农忙（春秋季节）的时候就来得频繁一点，农闲的时候就比较少，现在就是农忙撒，就两三天过来一次。过来种菜辛苦啊，尤其是天气热点的时候，到处都是蚊虫，咬得身上痒得很，但是还是要坚持来呀，对身体好的嘛。（资料来源：Y老人访谈，20170412A）

像他一样的退休工人几乎都不会每天照料菜地，他们在年轻时由于工作繁忙，每周只能前去一两次，而退休后，也仅仅以种菜为一种休闲方式，偶尔才去。退休工人实际上维持着在工人生活时期的耕种节奏，其对生活的感知与对该空间的理解也因此保持着原有的状态。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体化实践在长时间跨度下还原历史感知性的可能性。另外，耕种的间歇性一方面与农业种植的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社区统一的单位属性有关。因为早期在这里种菜的都是J厂工友，

① 主要是文化一村、文化二村和文化三村。

② 据多名受访者口述。

彼此有着共同的归属感，因而在保证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这些退休工人经常会互赠蔬菜，并不会对自己的菜地严加看管。在此处种菜约60年的J厂退休工人X老人，早年间还时常邀请街坊邻居到她的土地上各取所需、自行摘取。这一关系结构容易在社区结构改变后发生质变，后文将重点分析这种变化对退休工人的体化实践造成的影响。

#### 四、流动农民的进入与记忆的碰撞

在城市化与去工业化进程加快后，为响应市政府“退二进三”<sup>①</sup>、“退城进郊”的号召，J厂与政府在2003年签订了搬迁协议，并于2009年全部搬离杨家坪片区。取而代之的是某大型房地产企业打造的一个拥有6万居住人口，集住宅、大型商业贸易区、写字楼和教育等为一体的城市核心区的大型居住区（谭春剑，2008）。同年，Z空间陡坡区域山脚处，由重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修建的Z小区商品房迎来了第一批住户，某驾校也在不久后占据了平地区域。工厂空间的消失与耕地空间的环境变化，使工人们的记忆与情感载体产生巨变。继续在单位家属区居住、继续在土地上耕作实践，开始成为他们对工厂生活的记录与回忆。

可以说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安排造成了该区域的空间变化，而入住Z小区的流动农民造成了耕地空间格局的转变。早在西部大开发时期，重庆市城市社区中的外来流动人口比重就很高，一度达到了40%，超过了其他西部城市（边燕杰等，2013）。而伴随着市场体制与国有体制改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逐渐地打破了J厂家属区单一的职业结构。在发现缓坡区域的“城中地”后，一些中老年的流动农民便在陡坡区域开荒，成为“外头”的耕种者。N女士进入城市是为了帮女儿带小孩，在孩子开始念书后，她便迅速地将其菜地面积扩大到独占大半个陡坡，她的生活也从白天黑夜照料小孩转变为白天黑夜打理菜地。由于像N女士一样的流动农民的进入，虽然城市化率飞速提升，但Z空间“城中地”的面积却不减反增。可以说种菜就此成为流动农民适应城市的方式，他们试图将农村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嫁接到城市

---

① “退二进三”是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二产业退出市区，鼓励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市区发展。“退二”就是对内环路以内及附近重污染、能耗大、效益差的工业企业有重点、分层次、分区域、分时段进行搬迁、改造或关闭停产。

生活中，借此将自己带回农业文明的温床。

J厂的迁出为他们在陡坡区域大面积开荒创造了主要条件，因为随着J厂的搬迁，不再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倾倒于此，陡坡空间才得以大量闲置。在产业结构上，没有工业化的发展与转型，就没有城市化的推进；在居住结构上，没有单位制的衰落，就没有网格化的建立；在人口结构上，没有退休工人的谢幕，就没有流动农民的进入。这一切都在Z空间中以菜地空间的变迁形式上得以显现，即没有退休工人的“城中地”，便没有流动农民的“城中地”。

正因如此，流动农民并不与退休工人共享“记忆的微光”，他们的体化实践也截然不同。流动农民基本沿袭着在农村的耕种习惯。首先，他们会在土地里打农药、少量施用化肥。其中的B女士就表示“勒个雨水多了要打药，不打药就不得。”<sup>①</sup>其次，他们的菜地面积大、产量高，多数菜品用于贩卖。大部分流动农民都认为在“城中地”耕种比农村轻松多了，所以他们往往会在陡坡处开辟多块“城中地”，不同菜地用于种植不同季的蔬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收成。对于流动农民而言，种菜既是生活也是生产，他们的实践并不是出自动作记忆，而是现有的生活本能；而退休工人从耕种到食用所形成的一套固有的行为习惯，都是基于过去的记忆与生活，同时利用当今社会“锻炼身体、绿色食品”等话语为其行为制造合理性。

不过，流动农民的种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退休工人的实践过程。J厂搬迁后不久，X老人便从赠菜变为了卖菜。她和几个流动农民在卖菜时说“我们单个的菜少，卖得也比大棚菜贵，所以单独卖更不容易卖出去。大家一起卖，人多力量大！”<sup>②</sup>这样的卖菜行为在流动农民进入Z空间之后才出现。同样，流动农民的进入使得退休工人开始在意偷菜行为，通常在偷窃发生后，虽然不知是谁偷的，退休工人都会怀疑到流动农民身上。X老人虽然与N女士一起卖菜，却在笔者问及偷菜问题时当众质疑N女士“你不就偷过别人的菜吗？”<sup>③</sup>可见卖菜或许仅仅是为顺应现代社会互利共赢的手段，这一实践转变并不能构成长时间的记忆表达。至此，我们所述的“小市农”就Z空间而言，则仅表示为闪现“记忆的微光”的退休工人，即“里头”的“小市农”。

① 资料来源：B女士访谈，20160416。

② 资料来源：X老人等访谈，20170329A。

③ 资料来源：X老人等访谈，20170329B。

## 五、抗战博物馆与失地的可能

退休工人的记忆虽然通过种菜的一系列体化实践绵延至今，但在政策规划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基层政府在决策一处城市空间作何规划时，往往不愿尝试去理解个体记忆与宏观叙事的互相补充，而是将两者置于对立面，将个体记忆视作反记忆来处理。基于此，Z空间的“城中地”便会因其空间形态而如“城中村”一样，被界定为城市的“毒瘤”与伤痕。

官方赋予Z空间及其周边区域的记忆是抗战兵工记忆，以抗战洞穴博物馆为核心的抗战遗址公园将取而代之（强雯，2017）。该抗战洞穴博物馆是一个由24个防空洞、8个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聚落，已于2018年6月18日正式开馆，距离Z空间只有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路程。即便如此，基于对J厂的归属感与荣誉感，退休工人们早已将自己视为工厂的一部分、以厂为家。在“自家的”土地上耕种往往令他们相信自己的种菜行为是正当的。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Z空间的整改计划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当年因驾校进入回收了一部分农地，在Z空间唯一的政府痕迹便是近期才在陡坡脚的围墙处挂着的“绿化用地，禁止种菜”的警示牌。这使得“小市农”们始终对Z空间的私人性存有一定幻想。然而，现在不仅驾校已经搬离，就连从抗战洞穴博物馆前往Z空间的小路两旁，彰显抗战工业生产盛况的精致浮雕都跃然在围墙之上，一下将行人拉入抗战兵工厂的记忆。

笔者曾问过“小市农”关于因政府回收而“失地”的问题，D老人称“他（政府）来占嘛我们就让他嘛。我们到处去耍多好哟，北京天津到处去旅游。”<sup>①</sup> N女士也说“国家的土地他要占就占就是了嘛。做一伙也做得伤神，做得伤。”<sup>②</sup> Y老人则表示“勒是国家的规划的嘛，懂到没有。收了就不做了撒，就安享晚年了。”<sup>③</sup> 虽然他们口头上是这样表述的，但其种菜实践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却并没有停止，甚至在抗战洞穴博物馆正式开馆后也持续进行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记忆的持续性与这种体化实践对他们的重要性。Y老人念叨着“诶，那你说不想种呀，

① 资料来源：D老人访谈，20160416A。

② 资料来源：N女士访谈，20170412B。

③ 资料来源：Y老人访谈，20170412B。

看到别个种也想种，也不是说为了要吃撒子，只是说空闲的时间消磨哈时间是不是嘛。”<sup>①</sup>

X 老人的菜地曾在 2017 年末被铲掉一半，她十分沮丧。“他们（规划局）说要铲我的地，喊我把地头的菜处理好。说是这里规划了一条路，我的地正好在规划的区域。哎呀，我的南瓜也长得好，四季豆也开始爬杆杆儿了，我哪里舍得铲哟！”<sup>②</sup>可在施工放缓后，她又于 2018 年到 Z 空间的另一处拓荒，开出一小块菜地来继续耕种。这意味着种菜实践对于“小市农”的意义已经超越其本身，它是“小市农”们城市记忆的体化实践过程，是其城居生活的一部分。“城中地”也超越了“记忆之场”，成为“小市农”不自知的纪念场与象征空间，成为其精神与文化的承载物。

在即将遭遇的“失地”面前，“小市农”们“记忆的微光”逐渐显现，种菜作为“小市农”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被他们所自觉。正如 D 老人停顿片刻后讲道“别个说人死了不丢地，牛死了不丢草，不能丢，死了都不能丢地。”<sup>③</sup> M 老人也说：“（我）一直种到闭气嘛。”<sup>④</sup>这种体化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小市农”“记忆的微光”对官方记忆无声的呼唤，是对长时间生活的感知与还原。

## 六、讨论与总结

“小市农”的城市记忆在“城中地”空间中的表现与实践，是重庆市从工业化时代到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制度与社会变迁、工人与进城农民的碰撞中残余下来的“记忆的微光”。由于城市“记忆的微光”不仅反映着“小市农”对工业时期个体生活的长时期记忆，还映射出个体叙述与宏观叙述矛盾性与补充性的绵延。所以，后继进入城市并参与“城中地”耕种的流动农民并不能成为“小市农”。流动农民的体化实践并不是记忆性的，对于他们而言，种菜既是生活也是生产，其实践并非出自动作记忆，而是现有的生活本能；而退休工人从耕种到食用所形成的一套固有的行为习惯，都是基于过去的记忆与生活，是通过一系列体化实践逐渐将工业生活

① 资料来源：Y 老人访谈，20170412C。

② 资料来源：X 老人访谈，20171010。

③ 资料来源：D 老人访谈，20160416B。

④ 资料来源：M 老人访谈，20170329B。

的情感与记忆在城市空间中还原的过程。“里头”的“小市农”通过这样长时间的体化实践保留着记忆与情感，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因素造成的结构性矛盾。“鞍钢宪法”鼓励工人为工厂奋斗终身、跃进式完成集体生产的要求，与工人照顾个体家庭的生活需要形成了一组矛盾，使工人面临着工业生产与生活两相剥离的困境。而困难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紧缺问题，又进一步促使工人们自己谋求出路，于是“小市农”们便开始以种菜生活来补充“苦战”式生产。其种菜实践重塑着相关的城市空间，不断吸引同一境况的工人参与其中，个体叙述与宏观叙述的矛盾性与补充性不断缠绕，个体“记忆的微光”开始忽隐忽现。

第二，在长时间的社会变迁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小市农”在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冲击、流动农民的碰撞与宏观叙事的压迫下，仍保留着“城中地”的样态与种菜的习惯，这种作用于土地空间的动作完全依靠“小市农”对土地的理解与作用，因而“城中地”空间可以说是“小市农”城市记忆的视觉作品，是其记忆微光的保留形式。虽然随着流动农民的进入，“小市农”的种菜实践开始出现衍生物，如卖菜、在意偷菜行为等，但这一实践转变并不能构成长时间的记忆表达。或许这仅是为顺应现代社会、互利共赢的手段，而未影响“小市农”对自身土地的理解与内在情感，因而可以说其体化实践仍旧在复杂与变换之中保存着固有的特质。例如退休工人的耕作方式、种植面积和劳作时间等仍维持着最初的节奏与水平，这是他们在长时间跨度下进行种菜的一系列记忆动作的表现。可以说，种菜的体化实践并未像话语实践一样随着时间而模糊，相反却更加与记忆者的生活融为一体。

第三，闲置地空间是体化实践具象化的重要条件，保存在身体中的记忆通过“小市农”的一系列种菜实践作用于城市空间，逐渐将其情感与记忆在空间中还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城市中的闲置地空间都较多，可观可感的空间形态作用于耕种者与旁观者，使“小市农”的城市记忆获得进一步延续与传播的可能。这与“记忆之场”不同，是个体实践意义下的空间生产，而非宏观记忆的建构与抢救。但本文也指出，随着城市发展要求的变化，以智慧城市为核心的未来城市发展规划将越来越多地挤压闲置地空间，或者说非正规性空间的利用。因此“小市农”将如何通过体化实践使潜藏在身体习惯中的记忆具像化，或将成为其未来生活中最大的困境。这也将影响普通的城市居民在长时间中记忆与情感的保存、文化与精神的自发孕育。

芒福德(2005)曾提到,现代城市总是机械地把大地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而忽略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因而诸如博物馆或档案馆一类的纪念场所,只是将宏观的记忆理念分散到各个空间之中,而非在本地发现普通人的记忆叙事与情感。沙朗·佐金(2006)曾敏锐地指出,即便是最“无政治性”的城市历史保护,也常常会在社区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与目的下不断扩大,以达到政治与经济要求。城市建设往往忽略甚至敌对普通人的城市生活状态,无视“记忆的微光”对官方叙事的补充与解释,挤压普通人体化实践的空间与意义。所以,普通人“记忆的微光”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方叙事,如何超越“记忆之场”得到保护,仍是未知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虽然集体与个人、官方与民间的记忆和叙事常被视为二元对立,但就城市种菜行为而言,成都市郫都区的“可食地景”(eatable landscape)规划便为官方与民间叙述的协调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肖刚,2017)。或许政府借助类似的规划,可以更好地理解普通人的城市记忆与都市生活,并为个体与官方的结合起到推动的作用。对于个体的关注与尊重,将是未来社会努力的方向,从记忆研究的角度出发,关注普通人“记忆的微光”、与公众共享话语权,将是令生活回归于人的重要路径。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等,2013,《中国西部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蕴茜,2007,《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史学研究》第12期。
- 重庆市九龙坡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1997,《重庆市九龙坡区志》,重庆:重庆出版社。
-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1,《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城市农民”实际困难的通知》,12月22日([http://www.cq.gov.cn/publicity\\_zqsrnzfbgt/nylysl/nycmyyy/1851](http://www.cq.gov.cn/publicity_zqsrnzfbgt/nylysl/nycmyyy/1851))。
- 高萍,2011,《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高群,1991,《重庆市土地管理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郭于华,2003,《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008,《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郭于华、孙立平,2002,《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总第二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哈布瓦赫,莫里斯,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康纳顿,保罗,2000,《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隗瀛涛,1991,《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蓝宇蕴,2001,《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6期。

- 黎云, 2015, 《中国蓝盔部队的四大军事文化符号》, 新华网 5 月 3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31/c\\_111546318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31/c_1115463185.htm))。
- 李放春, 2010,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开放时代》第 10 期。
- 李里峰, 2007, 《土改中的诉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 5 期。
- 李娜, 2016, 《集体记忆与城市公众历史》, 《学术研究》第 4 期。
- , 2017, 《集体记忆、公共历史与城市景观: 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李培林, 2002,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梁东麒, 2015, 《即将消失的一片城市菜地》, 《中山日报》11 月 25 日。
- 梁立娜, 2015, 《传承历史文脉典藏城市记忆——关于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 《葫芦岛日报》9 月 22 日。
- 刘向南, 2017, 《保护老工厂: 山城重庆如何留住城市记忆》, 《界面新闻》11 月 1 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717276.html>)。
- 刘亚秋, 2010,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社会》第 5 期。
- , 2017, 《“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兼评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社会发展研究》第 4 期。
- 陆征, 2017, 《中国人的种菜天赋, 已经突破天际, 征服了全世界!》, 搜狐网 12 月 25 日 ([http://www.sohu.com/a/212658577\\_481874](http://www.sohu.com/a/212658577_481874))。
- 芒福德, 2005,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孟德拉斯, H, 2005, 《农民的终结》, 李培林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纳日碧力戈, 2003,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 期。
- 诺拉, 皮埃尔编, 2015,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黄艳红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彭和强、傅瓦利、张有能、顾君铭、唐睿、施能、梅建波、符克丽, 2011, 《城市土地闲置及耕种闲置地现象研究——以重庆北碚区为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 期。
- 强雯, 2017, 《抗战兵工遗址·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诞生记》, 《重庆日报》12 月 8 日。
- 孙江, 2004, 《事件·记忆·叙述》,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谭春剑, 2008, 《重庆建设厂昨正式搬迁华润百亿原址建居住区》, 《重庆时报》8 月 29 日 (<http://news.focus.cn/cq/2008-08-29/524529.html>)。
- 汪志, 2017, 《城里“种菜”记》, 新华网 7 月 26 日 ([http://www.gs.xinhuanet.com/dushu/2017-07/26/c\\_1121381946.htm](http://www.gs.xinhuanet.com/dushu/2017-07/26/c_1121381946.htm))。
- 王汉生、刘亚秋, 2006,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社会》第 3 期。
- 王晓葵, 2012, 《“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学术月刊》第 7 期。
- 温铁军, 2017, 《市民下乡与农业进城——农村新政解读》, 搜狐网 4 月 21 日 (<http://www.sohu.com/a/>

135598277\_ 653202)。

项飏, 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肖刚, 2017, 《城市荒地变菜地这些郫都人种菜种出了景观(图)》, 《成都商报》7月3日 (<http://cd.qq.com/a/20170703/005344.htm>)。

肖轶、魏朝富、邵景安, 2015, 《重庆市土地利用平衡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许经勇, 2013, 《城镇化的一道坎“城中村”》,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期。

张海波、童星, 2006, 《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赵铁琥, 2015, 《巴南市政: 清理占绿种菜现象恢复公园干净整洁》, 华龙网12月18日 ([http://cq.cqnews.net/cqcx/html/2015-12/18/content\\_36019500.htm](http://cq.cqnews.net/cqcx/html/2015-12/18/content_36019500.htm))。

郑福昌, 1992, 《重庆市房地产志》,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 1977, 《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工业用水与废水》第1期。

钟穗慧, 2016, 《禁止种菜的“城市菜园”》, 网易新闻人间栏目10月19日 (<http://renjian.163.com/16/1019/16/C3OM4C0H000181RV.html>)。

周勉、郭强、张志龙, 2016, 《大城市里的“种菜族”: 是乐趣还是无奈》, 《半月谈》7月15日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6712/203354\\_2.shtml](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6712/203354_2.shtml))。

周玮、朱云峰, 2015, 《近20年城市记忆研究综述》, 《城市问题》第3期。

佐金, 沙朗, 2006, 《都市与文化译丛·城市文化》, 张廷佳、杨东霞、谈瀛洲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Bergson, Henri 1990, *Matter and Memory*. New York: Zone Books.

Boyer, M. Christine 1994,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rinson, Mark 2005, *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yden, Dolores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auvy, Alfred 1969,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张彦

inequaliti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nd optim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y. Bu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has reduced satisfaction on government work in economic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However , in terms of identity integration , urban identity and local identity did not enable peasants positiv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even reduced the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urban governments ne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inequality of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 which would further encourage heterogene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strengthen the their identity sense to the urban society.

The Analytical Logic of Weak Ties Strength: A Comparison between Absolutism and Relativity

..... *Liu Youchi* 154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ocial networks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deeper analysis of certain basic concepts and its internal logic. This paper analyzes a basic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namely , weak ties strength. We analyze two research paths in the ties strength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 which are named as the Absolutism and the Relativity of ties strength analysis.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definition , basic logic , the concepts and logic of use in egocentric networks analysis ,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alysis, “bridge” ties analysis and propag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research paths , and investigates the strengths of weak ties and strong ties.

Urban Memory and Incorporating Practice of Small Urban Farmers: A Study on Farming Life in Z Space in Chongqing .....

*Zhang Yiming* 173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corporating practice of small urban farmers in Z space , an urban farmland in Chongqing.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ncept of memory glimmer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Les Lieux de Mémoi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emory glimmer only exists among retired workers in Z space , thus the concept of small urban farmers only represents retired workers. On the one hand ,the *An Steel Constitution* encourages workers to struggle in the factory for life and leap-forward to complete the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of collective production ,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needs of new workers to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ies , making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life of workers. They have to grow plants to fulfil their own desires , inducing their memory glimmer. On the other hand , small urban farmers still retain their urban farmlands and the habit of growing vegetables , even though they are facing the impact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 collision of moving farmers and the oppression of macro narratives. It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practice and living spaces for memory glimmer.